元始建明改建清移建——

博兴锦秋亭兴衰往事

徐健 张基地

文脉就是文化的传承有序，虽有间断，但总会续接承传。清丽壮观的博兴锦秋亭始建于元初中统年间，其历史悠久，文脉绵延，闻名遐迩，美名远传。迄今七百六十年间，锦秋亭有三次重大建设，元初中统间（1260～1264）邑人始建，明嘉靖年间（1522～1566）改建，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移建。惟明嘉靖年间改建不甚明晰，略重点考述之。文人雅士锦秋湖边登亭赏景，吟诗作赋，留存下了千古绝唱及锦秋亭不同时期的历史场景，尤足珍贵。

康熙六十年《博兴县志》博兴县治图中“锦秋亭”位置图。

锦秋亭故址碑，现存博兴县博物馆。

锦秋亭取苏东坡《和文与可横湖绝句》“卷却天机云锦段，从教匹练写秋光”中“锦”“秋”二字命名

著名元方志编纂家于钦（1284～1333），字思容，山东青州人。他所编《齐乘》是山东幸存的唯一一部明朝以前的志书。《齐乘·古迹》记载：“锦秋亭，博兴东南城上，中统间（1260～1264）邑人所建，取坡诗命名。”于钦“昔尝过之，爱其风景绝类江南。赋诗亭上云：‘霜风收绿锦，万顷水云秋。海气朝成市，山光晚对楼。舟车通北阙，图画入南州。且食鲈鱼美，吾盟在白鸥。’”文中所言锦秋亭“取坡诗命名”，乃是取苏东坡《和文与可横湖绝句》：“卷却天机云锦段，从教匹练写秋光”中“锦”“秋”二字名亭。

而后，锦秋亭作为山东名胜被载入《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山东通志》等志书，且多是采用了于钦《齐乘》中文字。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的《湖上早春》是最早吟诵锦秋亭的名诗：“溪上春无赖，清晨坐水亭。草芽随意绿，柳眼向人青。初日收浓雾，微波乱小星。谁歌采苹曲，愁绝不堪听。”

清朝著名文学家王渔洋（1634～1711），康熙四十三年（1704）罢官归里，其家与博兴隔湖相邻，多有锦秋湖记游文字。王渔洋在《锦秋亭记》中记述了他所知亭的改建：“由东城骑行而南，舍骑，过石梁，登笔架山。山叠土石为之，三峰起伏，杂植桃柳，锦秋亭在东峰。此亭元中统所建，《齐乘》以为在东南城上，而山乃嘉靖甲辰佥事黄鳌所筑，则亭之移，当在是时也。”其文中“山乃嘉靖甲辰（1544）佥事黄鳌所筑，则亭之移，当在是时也”，及“今湖与亭皆称锦秋，盖湖从亭名矣”的考证，多为后人所采信。近经查阅四部旧《博兴县志》等典籍，试补正如下。

顾铎撰写《博兴庙学山井记》，记述了聚土为笔架山、凿井为池工程

邑人顾铎（1488～1552），字孔振，号警斋，又号南田。明正德丁丑年（1517）进士，授浙江山阴县知县。曾任刑部主事、汝宁知府、开封知府、信阳兵备副使、陕西太仆寺卿。著《南田集》。回乡后，顾铎居住在笔架山附近，并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前建了高大的藏书楼。顾铎在博兴留有大量诗文。

他应邀撰写的《博兴庙学山井记》载：“近者佥宪黄公鳌分巡至邑，周环相度，谓‘门临陡皇则衢未亨，望属低陷则气不翔’，出罚金买田一十四亩，命构桥台、凿池而亭于台池之上。审若是，亦一邑之胜而藏风气者也，奈何历三令而俱未遑也？”由上文可知，黄鳌仅是出罚金买田，提出了“构桥台、凿池而亭于台池之上”的建议，可惜“历三令而俱未遑”，换了三任县令都没有顾及该建议的落实！“壬子（1552）岁，二尹杜君孔禄乃聚土为山，山下凿井焉”。

也就是说嘉靖三十一年，县丞杜孔禄完成了聚土为笔架山，凿井为池的工程（据顾连璧文，杜完成了桥和笔架山的工程，没有“凿井为池”）。诸生孙应溪等人、国子生顾存仁为此请顾铎撰写了《博兴庙学山井记》。顾铎对尚未完成的凿井为池、山巅建亭给予了规划并充满希望。

明时知县刘廷琮改建锦秋亭于笔架山东峰

然此文亦有疏略之处。其后，顾连璧所撰《博兴县学重修风水记》中关于锦秋亭的文字，补正了顾铎文章的疏略之处，及顾铎逝世后的锦秋亭建设情况。其文曰：“岁甲申（1524），佥宪黄公鳌东巡谒庙，周回览视，谓‘朱雀主文明之象，而南方低陷，非宜’，乃捐金置学田一十四亩，令架桥为山于门之外，业置田已，事竟中止。”“壬子（1552）春，县二尹杜君孔禄任其役，即所置田桥者桥，山者山，而黄公之志始成云。”“丁巳（1557），邑侯刘公廷琮复于山后浚井凿池、亭其上焉。”也就是说，壬子（1552）春，县丞杜孔禄完成了桥（迎秀门南的登瀛桥）和笔架山的建设；丁巳年（1557），知县刘廷琮在笔架山后浚井凿池、改建锦秋亭于笔架山的东峰。

改建锦秋亭于笔架山的时间乃丁巳年（1557），并非王渔洋所言：“山乃嘉靖甲辰（1544）佥事黄鳌所筑，则亭之移，当在是时也。”顾连璧所撰《博兴县学重修风水记》中有“岁甲申（1524），佥宪黄公鳌东巡谒庙”的明确记载，相信王渔洋游博兴孔庙时应是见过顾连璧所撰《博兴县学重修风水记》碑文，王渔洋所记“山乃嘉靖甲辰（1544）佥事黄鳌所筑，则亭之移，当在是时也”，则是将“甲申”误记为“甲辰”！可从全文的时间逻辑关系细看，不辩自知。

自壬子（1552）年，建登瀛桥和笔架山，佥事黄鳌的关于县学风水的建议初成。至壬申年（1572），两科诸生没有中举者，认为“文运犹未泰乎？”欲再次进行县学风水整建，知县王尧臣应诸生所请，遂与同僚各捐俸若干，仍请士夫乡民尚义者共济美举。“月余乃成，将勒诸石，以征余文”，顾连璧“姑摛词以记其盛”。可知《博兴县学重修风水记》撰文于壬申（1572）年。

丁巳年（明嘉靖三十六年），知县刘廷琮移建锦秋亭于笔架山（亦名奎山）东脊，更方便游人呼朋唤友登临赏景，把酒言欢，留下了无数吟诵锦秋湖、锦秋亭诗词歌赋，不胜枚举。

康熙八年重修后，锦秋亭成为博兴文人社团雅集活动场所

王渔洋成书于顺治十三年（1656）的《落笺堂集》有博兴游湖所写《笔架山作》：“笔架山前水正清，博姑城下几舟横。白云无尽秋天远，水国凉思一夜生。”还有写于康熙二年（1663）的《送家兄礼吉归济南兼寄子侧》（又绝句二首，选一）：“锦秋湖边稻花凉，锦秋亭下鲈鱼香。垂虹秋色一千里，秋到吴淞思故乡。”此时锦秋亭虽未重修，却也是诗人寄托乡思的著名景点。秋色惹人思乡，送别亲人归里，念及“亭下鲈鱼香”，引起王渔洋对家乡的无比思念。

康熙十二年《博兴县志》“方舆志”载：“奎山，一名笔架山，在迎秀门外，累土为之。山上有亭，山下有池，俯瞰城市，远眺湖光，柳色春媚，荷香夏凝，亦一大胜也。”注曰“亭名锦秋，详载《古迹》内”。此即“皇清康熙八年训导迟龙宾捐俸重修”后，笔架山及锦秋亭的景况。

山东清代修志名家李焕章（1613～1688）常与博兴友人聚会，其《锦秋湖同人泛舟赋》曰：“余友东莱钱伯衡先生，忠烈名胄，骚雅宗盟，广文蒲姑。其地有孝廉许君镇南，文学马君子唯、王君介士、贾君炅寅，雄文伟望，振动时流。于孟秋之日，暑气已退，凉飓频来，招余锦秋湖上爰集。”《锦秋八友记》记载：善琴、善棋、善书、好诗、工画八友者，博邑高士也，被呼为锦秋八友，“结盟联社于锦秋亭上。期花之花朝，上巳清明，夏之清和端午天，猎秋之七日，中秋之九日”之时，他们泛舟游湖，吟诗作画，弹琴清唱；“元夕长至，荧籽春灯，爽皑霁雪，则聚饮锦秋亭中，意兴如椎浆，时十五年于兹矣”。

李焕章逝世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所记锦秋亭应为康熙八年（1669）训导迟龙宾捐俸重修后的锦秋亭。李焕章不愧为修志名家，其“结盟联社于锦秋亭上”，记载了博兴历史上第一个文人雅士成立社会团体的时间地址及活动时间、活动内容。他们坚持活动，从未间断，“十五年于兹矣”，也就是说康熙八年重修后不久，锦秋亭就成为博兴文人社团雅集活动的场所。

康熙五十七年知县李相于旧亭东复建锦秋亭

康熙五十五年（1716）至六十一年任博兴知县的李元伟，纂修的康熙六十年《博兴县志》“方舆志·古迹”云：“锦秋亭，元中统间，邑人建于东南城上……亭后移至奎山东脊，岁久倾圮（由此亦知，康熙八年训导迟龙宾捐俸重修的锦秋亭存世亦不太久）。康熙五十七年，知县李相度地势，于旧亭东百余步（一尺为0.32米，五尺为一步），得水中小洲，筑使高阔，建亭数楹于上。有曲栏迴砌，水色侵阶，花香入户，渔艇往来于绿荷白苹中，不啻赤县神州之在瑶岛，博邑名胜遂为第一。”

李元伟将湖中小洲“即渚为基，浚下益上，固以金椎，缘以石砌，作亭其上，仍名之曰：‘锦秋亭’。书院开于南，郑公祠建于北，鼎峙若三岛然。”他“每当风霜高洁，潦水澄清之候，偕客二三临眺其上，城睥西障，东畴一望无垠，惟见黍稷稻粱，稂稂蕃熟，白苹红蓼，黄叶丹枫，渲染成彩，湖光天光，碧色互相映衬，而鸿雁一声，历落点次于青冥之中。余乃把酒临风与满沟满车之父老子弟，为之鼓腹而庆丰年焉。”

支脉河小清河二河改道，锦秋湖“湖已非湖”，锦秋亭也成纸上记忆

仅仅十年，锦秋亭与锦秋书院已“皆毁”。漫寻其踪，锦秋湖以锦秋亭得名，锦秋亭以湖水丰盛而风光旖旎。锦秋湖的水源于小清河、支脉河二河长流水，与二河共盛衰。明嘉靖时，治城河（直身河）自城东南龙王庙庄（今锦秋街道东风村）引小清河水入城壕，围城周遭，复东流，由天齐庙而东。明成化九年（1473）开挖支脉河，其水从高苑县（今属高青县境）进境入锦秋湖，从湖东北注龙河洼流向乐安县（今广饶县）。自康熙五十七年（1718）知县李元伟修支脉沟，其流不复至城下。

诚如道光《博兴县志》“卷二·河渠志”所言：原支脉河有“流水沟迹，自锦秋湖东下，由大石桥洼、流舟洼（即龙注洼——原注）、宽阔稍洼等处，步步渐低，曲折入海，从无水患。至康熙五十七年，始挑成河，有博兴高工房不顺水性，引向东北高亢之处，遂致碍难下流，壅水反逆。”支脉河、小清河二河水流不复入湖，故锦秋湖水源奇缺，湖水日少。

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任乐安（今广饶）知县时，于雍正九年（1731）至乾隆三年（1738）间，多次往来小清河诸水考察，据其《山东水利管窥略》一书记载：小清河“高苑县之军张闸迤东至博兴之湾头庄，淤塞四十六里，俗呼曰乾河。”当时支脉河流经的锦秋湖，“南北不过一里，东西不过半里，深不及二尺。至于宽阔梢，非湖非泊，不过芦草之荒荡。”锦秋湖已非往日之锦秋湖，自此，湖亭相映，风光旖旎的佳境佳情消失于人们的视线之内。

自晚清始，锦秋湖“春夏常涸，秋乃有积潦”，湖已非湖。虽然如此，博兴重建锦秋亭的梦依然未息。民国二十五年（1936）《博兴县志》有补记：“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县长张其丙因锦秋亭遗址，重行修建，顿复旧观。”今经访询老县城里十几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皆言对此亭没有记忆，“重行修建，顿复旧观”，实乃蓝图，并未实施，可谓虚记。与民国二十六年相隔五年，1942年出版的兴亚宗教协会编的《华北古迹古物综录》亦载：“锦秋亭，张其丙立碑书‘锦秋亭故址’，已成旷地，改为锦秋苗圃。”锦秋亭实已成为纸上的记忆。

历经沧桑的锦秋亭虽已成为纸上记忆，但其文脉绵延不绝，祈愿博兴胜地之胜景锦秋亭盛世再现，赓续历史，美名永传。

官家的马咱养不起

侯玉杰

图片来源网络

明朝时期，在军事管理体制方面有许多独到之处，如实行卫所制度，就是将地方户籍管理军事化，化“编户齐民”为军事农民，如今留下了许多知名的地名，如威海卫、石臼所等；明朝军事管理体制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设置巡抚、兵备道，以军事为主兼管监察、盐务、水利、驿站等，监管范围也不固定，且设置、取消和辖区不固定，主官不是常设官，而是差遣官。

武定兵备道设置于正德七年（1512年），起初辖2州18县，即滨州、武定州和阳信、商河、海丰、乐陵、蒲台、沾化、利津、青城、新城、齐东、陵县、济阳、德平、临邑、章丘、邹平、长山、淄川县，不久，长山、淄川县划属青州兵备道。武定兵备道辖有5个巡检司、1个千户所，马、步军，舍、壮、快，合计统辖5604人。

武定兵备道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负责当地青壮年军事训练。到了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金坛人、山东按察司佥事、主管武定兵备道的王烨，针对操练中的种种弊端，上书山东巡抚、都察院，提出了精简操练青壮年的改进意见。王烨的意见建议最终得到山东巡抚的赞同，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因此，嘉靖《武定州志》称赞说：“时巡抚都御史端公详允，俱依拟举行，民到于今便之。”

扒着门缝看历史。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国家运转所需要的所有人力、物力、财力，最终都会传导到最基层的百姓身上，如同房屋的地基，埋在地下，最不显眼，却承受最大压力，出现小问题又很难被及时发现，一旦问题暴露，往往就是疾风暴雨的大问题。老百姓最终承受不起的压力，也是一点点积累形成的。我们平时读历史书，农民起义似乎就是官府横征暴敛，然后民不聊生，不得不走上梁山。其实，压死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或许就是我们熟视无睹的一件平常事。比如，武定兵备道每年的青壮年农民进行军事训练一项，就得动用2475人，耗费银两超过2万两，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支出，相当于2000多户普通百姓一年的日常支出。积少成多，粒米成萝。一件一件的小事，积累成大事；一项一项的零碎支出，最终积攒成老百姓不能承受之重。

扒着门缝看历史。兴利除弊，一直是执政者追求的目标。利与弊，其实是一对孪生兄弟，所谓祸福相依，利弊相生，好像兴利就好，其实不然，过犹不及。咸丰《滨州志》中收录了滨州知名乡贤、杜受田的远祖、康熙年间河南参政杜漺的文章《滨州革除歇家批头记》。杜漺认为：“尝闻利有大小，弊有浅深。兴一利不如除一弊，盖弊之所在，黔首之身家胥系焉。夫家既破，则身不能完；身既亡，则八口无所寄。此为民上者所当闻而心痛者也。”杜漺所赞扬的革除弊端，其实，一开始是为了方便百姓的利民之举，随着时间推移，弊端越来越多，再加上办事人员的上下其手，慢慢发生质变，好事就变成了坏事。比如，武定兵备道有一项官马民养的案例，本来是好事，官府为了节省开支，将官马散养到民户家中，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不仅补贴不足，而且因为马匹的生病甚至死亡，农家需要赔偿，因此，谁家领养了官马，谁家就几乎注定要破产，这成了伤害武定兵备道所辖百姓的一项致命措施。

三天的时间读这篇文章，至今我也没有完全弄明白。一是自己的古文功力不过关，尤其是公文类；二是历史背景不过关，特别是典章制度，历史基础不过关，很惭愧；三是历史有时真的如烟，时过境迁，脱离了那个时代、那个环境和语境，如此研究历史，往往就会隔着窗纱看美人或者灯下看美人，历史研究任重而道远。

《枣儿香枣儿圆》近期出版

系国内首部沾化冬枣创业史题材小说

滨州日报/滨州网沾化讯（通讯员 贾海宁 报道）一群枣乡热血青年，为摆脱贫穷落后的生存面貌，怀揣梦想，艰苦创业，奋斗不息，终于将冬枣产业做大做强……

一部全景式反映沾化冬枣创业史的长篇小说《枣儿香枣儿圆》将于近日出版。小说以农民视角再现了沾化冬枣产业成长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以及围绕沾化冬枣创业，友情爱情亲情交织在一起演绎出的激动人心的故事。

该书是沾化区作家刘洪鹏新作，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枣儿香枣儿圆》是目前国内首部描写沾化冬枣创业史的长篇小说。小说故事内容跌宕起伏，人物性格刻画鲜明，描绘了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人情世故、恩怨交织和时代变迁。作品讲述了宋拴柱外出打工、精学厨艺、创业开店等致富之路，又写出了福来、栓亭、二愣等人在致富奔小康的征程上一路跌跌撞撞，将满腔热血寄托于冬枣种植上的坎坷经历。

全书文字纯净温馨，生活气息浓厚，共29章，20余万字。在主题、人物塑造方面，小说聚焦现实题材，用大篇幅展现出改革开放后新农村建设全貌，褒扬了农民淳朴、善良、勤劳的珍贵品质。作者儿时生活在农村，具有深切的亲身体会和丰富的素材积累，善于讲述与农业发展相关的感人故事，具有较高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